

“技术封建主义与文化霸权研究”专栏

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的新向度

赵淳¹ 曾丽瑾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2. 四川美术学院 通识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技术封建主义是西方学界最近提出的一种理论话语,它力图对当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新状况进行阐释。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而对于其文化影响则未有阐述。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封建主义题旨已然溢出单纯的经济疆域和政治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语境中,技术封建主义的文化逻辑主要在知识垄断和大数据操控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通过窃取或掠夺而来的知识,文化霸权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下的信息推送,根据大他者的欲望而结构起来的主体欲望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放大。由此,文化霸权以一种全新的样态给主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规约。

关键词: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知识垄断;大数据;欲望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2-0133-13

0 引言

技术封建主义是西方学界在最近几年提出的一种用以理解、描述和阐释以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为表征的资本主义状况的一种理论话语,它主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展开。

数字经济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形态之一,它的勃兴驱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深刻地影响了传统模式。包括美国的谷歌、苹果、脸书和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数字科技巨头,在数字革命的条件下,对当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施加了持续、全面、越来越强的制约和操控。这样的影响必将传导到人们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而重新规约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重塑社会的宏观政治层级与微观文化权力的生态圈。因此,在勘测和绘制其政治经济学向度上的版图之外,我们有必要对其施加给社会、历史、文化的主要影响做一些先期研究,并由此为进一步辩证、全面、综合地理解与把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精神分析学之马克思主义维度研究”(19BWW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淳,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曾丽瑾,女,四川美术学院通识学院助教,博士,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赵淳,曾丽瑾. 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的新向度[J]. 外国语文,2024(2):133-145.

握技术封建主义的文化逻辑做出必要的理论铺垫。

1 问题的提出以及学界的讨论

1.1 技术封建主义的提出

2020年,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出版了《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批判》(*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 Paris: Zones)。在此书中,杜兰德参照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模式,对当下的数字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阐释。他认为,由于专利壁垒的闭锁,科技巨头形成了某种靠技术垄断来获取利益的模式,这与曾经封建时代的地主靠地租获利的架构在若干层面上颇有相似之处。由于“数字经济的社会关系——网络用户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科技巨头无法逃避的领域——与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类似”(Durand, 2022:29),当下的投资开始变为以掠夺为导向。在他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资本主义围绕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初衷。

这个题旨立即就引发了西方学界的强烈关注。欧洲经济学家、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和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两人一起讨论技术封建主义的视频,从2021年11月1日上传到YouTube以来,迄今已有了54万多次的观看量(Varoufakis, 2021)。在2022年的另一文中,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 2022)明确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正在被一个以技术封建主义为特色的新制度所取代。”这个制度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那么,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答案是:这是一个由市场内提取的私人利润(注意:并非租金)驱动的系统。(相比之下,封建主义是由市场外的租金驱动的。)”我们知道,根据马克思(2009:822)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更替,是一种经济结构对另一种经济结构的取代。如此,就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而言,就像曾经的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封建主义一样,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 2022)断言:“今天的资本主义正被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所推翻:技术封建主义。”

在此,我们注意到,瓦鲁法基斯对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解和界定,与他之前的杜兰德有所不同。对于封建地主来说,其主要的利益来自于以地租为核心的各种租金,至于租地的农民怎么经营土地,封建主并不关心。而在当下语境中,包括谷歌、苹果、特斯拉在内的科技巨头大量投资于科技研发,这与躺着吃地租的封建地主显然不同。对此,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 2022)提出了“控制资本”(command capital)概念来加以解释:“标准资本包括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相反,控制资本包括组织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即是说,资本的拥有者不再需要拥有工业生产资料,而是仅仅通过拥有体现为控制资本的私有化信息网络便可榨取巨大的新价值。他认为,在此意义上的技术封建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先进得

多但同时又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封建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1.2 《新左派评论》上的论争

从2022年以来,杜兰德的《技术封建主义》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掀起了一场学术论争。该期刊在2022年上半年刊发的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技术封建理性批判》(*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一文对当今以杜兰德《技术封建主义》为代表的相关理论话语的滥觞和推进作了系统性回顾。文章对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们试图以封建主义经济架构为坐标来理解当代数字革命和科技发展的理论尝试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新技术条件下,无论外在世界看起来如何风云变幻,其内在逻辑其实并无实质变化,“资本主义正在朝着一如既往的方向发展,利用它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越便宜越好”(Morozov, 2022: 126)。而数字科技正好有可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技术上的支撑,仅此而已。没必要用定义尚不清晰的“技术封建主义”来界定当下的资本主义新样态。

2022年夏天,杜兰德在《新左派评论》上撰文回应莫罗佐夫的质疑与批判。他认为,“无论技术封建假说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这都是事实”(Durand, 2022: 31-32),因为它较好地反映和揭示了当下经济样态的某些特质。资本主义的数字前沿正在发生一种质的突变,即通过掠夺性手段——政治上允许的租金和垄断——以类似于封建征用关系的方式积累利润,而不是驱动资本剥削的“通过创新积累”的经济冲动。但他也承认,“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糟糕的旧资本主义制度中还是一种新的邪恶制度中?答案在经验上仍不确定”(Durand, 2022: 39),因此有必要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探索下去。

2023年上半年,塞西莉亚·瑞卡普(Cecilia Rikap)的《资本主义如常?:数字知识垄断的含义》(*Capitalism as Usual?: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Intellectual Monopolies*)继续了这场论争。作者认为,引发杜兰德和莫罗佐夫分歧的关键点在于他们对源于数字行业的新生产关系的那种新的经济文化现象的理解大为不同。文章指出,虽然当下的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由前所未有地对他人行使知识垄断权的公司来施行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对劳动力的剥削仍然存在”(Rikap, 2023: 160)。由此,瑞卡普建议,我们既不能如杜兰德那样激进,也不能认同莫罗佐夫所坚称的这只是像往常一样的最新一轮资本主义,而是要以具体的科技巨头公司为例,在这个题域中进行深入、细腻、全面的研究,如此方有可能达成合理的理解、阐释与预测。

1.3 国内的研究

虽然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科技巨头和网络电商的发展也具有某些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Rikap, 2023: 146),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截至本文完稿,在中国知网上仅有两篇直接研究这一题旨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批判》认为,“资本主义仍朝着它一贯的方向发展,它利用一切资源、一切手段来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无论这一手段是投资、创新与经济剥削,还是带有封建因素的租金、征用与掠夺”(吴鑫,2023:148)。这实际上是对莫罗佐夫的观点的支持。而《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则认为,技术封建主义是“在科技进步中的政治退步”(涂良川等,2023:225),这一论点延续了莫罗佐夫梳理的西方左派理论家的立场:“大多数关于新封建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的左翼严肃文献……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政治体系,而不是一种经济体系。”(Morozov,2022:112)从资本主义倒回封建主义,当然是一种政治退步。

除此之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国内学界对于构成了技术封建主义论争的学理铺垫的知识垄断和数字化也有过一些研究。涂良川、潘依林《“知识垄断资本主义”重塑资本逻辑的政治叙事》(《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5期)和李妍《知识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6期)着重研究了知识垄断的某些侧面。《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数字化批判》(《哲学动态》,2022年9期)一文则将研究重心主要框定在对数字化生活的社会性的考察上。

实际上,在杜兰德之前两年,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概念便已进入学界视野。2018年出版的《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s*)一书指出,网络服务以通常是免费的方式从网络收集数据,并获取数据交换中产生的市场价值——“我们将这种当代体系称为‘技术封建主义’”(Posner et al.,2018:232)。而在2016年《卫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中,莫罗佐夫(Morozov,2016)设想:“未来的政治任务是利用数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不是让硅谷迎来一种新形式的封建主义。”即一种始于经济的新样态必将影响政治生态,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分配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莫罗佐夫预判了那之后的相关研究的理论切入角度: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

就技术封建主义这个主题而言,虽然学界一时还难以达成共识,但此类研究无疑开辟了一个问题场域,提出了一个问题意识。这为当今的学术前沿探索给出了一个思考和研究的方向。在高度重视问题的伽达默尔(Gadamer,2006:356)看来,“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它给出了意义的方向性。这也是海德格尔(2003:190)所说的“若没有终有一死的人的留神关注,物之为物也不会来”,一个富含学理价值的问题的提出,是学术推进和理论提升的基本前提。

2 总体性原则下的研究视角

在技术封建主义问题域中,当下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众说纷纭,难成共识。在此情势下,方法论意义便凸显出来。在康德那里,事物的特性总是与观察者所取的观察角度有关,这便是后来的尼采(Nietzsche,1968:267)提出的“‘视角主义’

(perspectivism)原则”。巴赫金(2009:283)进而认为,视角的选择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因为“新的描绘方法使我们看到可见现实的新的方面”。而哈贝马斯(2001:34)则指出,在这个理性萎缩的时代,内容合理性将变成结果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又取决于人们解决问题所遵守的“程序合理性”。这意味着,只有首先在认知架构和路径策略上厘清了研究视角,才有可能在学理层面上有所成就。

2.1 溢出经济与政治疆域的封建化视角

30年前,哈贝马斯(Habermas, 1991: 231)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西方社会的某种再封建化倾向:“面对干预主义政府的‘新重商主义’,这种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文化和宗教力量的代表一起,导致了社会的‘再封建化’。”更有甚者,“公众的理性批判辩论也成为这种‘再封建化’的受害者”(Habermas, 1991: 158)。而晚近资本主义的当下发展也确实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也许是意想不到的画面——“在21世纪,世界上的强迫劳动者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Bales et al., 2009: 7)。这种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退步,喻示着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样态。西格哈德·内克尔(Neckel, 2020: 474)从社会学角度对再封建化进行考证,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前现代的社会形式、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正在复兴”。由此,内克尔通过将自己的触角拓展进社会学领域,形成了某种跨界研究的突破态势。

20年前,大卫·哈维(Harvey, 2003: 147)提出了“剥夺性积累”的观点,他指出,依靠知识产权,资本开始了自己的割据运动,这意味着“剥夺性积累的全部的新机制已经开启”。这一洞见在理论上为后来的西方学界对技术封建主义的研究给出了学理准备。哈维指出,哪怕在马克思揭示的原始积累中,对于那些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不相协调的前资本主义技能、社会关系、知识、思维习惯和信仰,要么以文化的名义进行压制和挪用,要么直接用暴力加以镇压。“原始积累既需要挪用和选用早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成就,又需要对抗和取代这些文化和社会成就”(Harvey, 2003: 146),这表明,资本积累——无论早期的原始积累,还是当下的剥夺性积累——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中,它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

10年前,国内的研究人士开始关注作为新科技爆发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大数据,指出“人类使用数据的巅峰形式,是通过数据训练机器,让机器获得智能”(涂子沛, 2014: 336),因此未来人们有必要“把数据这个科技符号变成个文化符号”(涂子沛, 2014: 338)——这个颇有气魄的呼吁,当然是建构在科技的快速演进必然会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一个认知前提之上的。虽然在对大数据时代的文化体认方面仍颇有不足,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超越单纯的政治经济空间的文化思路。

综上,源起于经济空间并蔓延到政治领域的技术封建主义题旨,已然溢出单纯的经济

空间和政治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

2.2 封地属性及其文化指向

为了阐明当下的新技术条件,诸如“技术封建”“数字封建”“信息封建”“智能封建”等新概念在西方学界不断涌现。通常理解中,封建主义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考证中,源起于拉丁语 *feodalis* 的“封建的(*féodal*)”一词早在中世纪就开始出现。在17世纪以前的法国,“封地(*feodum*)”指的是不动产的一种形式,而“封建的”则被理解为与封地有关的事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封地”和“封建的”这两个词更多的是某种“‘律师的术语’,而非历史学家的术语”(Bloch, 2004: xxiii)。这一系列词汇从法律领域被借用过来指称一种在今天的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状态,始于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伯爵在1727年出版的《关于议会的历史信件》(*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s*)一书。随后,孟德斯鸠开始将这一系列术语与特定的社会形态关联起来,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将这个概念从法语推向了欧洲其他语言。如此一来,“在当今的使用中,‘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涵盖了一系列复杂的观念,其中所谓的封地不再占据重要地位”(Bloch, 2004: xxiv)。

今天,信息和数字网络通过知识产权建构起了强大的新型权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经济从以利润剥削为主的资本主义逻辑转向了租金剥夺的封建逻辑。在资本主义新样态下,人们“甚至不需要成为资本家就可以争夺剩余价值的份额”(Foley, 2013: 260),譬如,工程机械、公寓和商铺的拥有者可以以此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这就像某些拥有热播歌曲版权的流行歌手,只需躺着收费(收租),而不必继续保持创作激情。哈维(Harvey, 2014: xii)在2014年就注意到了这一过程,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试图靠租金生活,而没有人投资制造任何东西,那么显然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一场危机。”如是观之,当今资本主义新状态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以知识垄断和数字革命为体征的“封地”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学界会认为它是一种倒退的重要原因。

在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医药公司借助以专利为手段的技术封地牟取巨额利润,以至于神油店老板程勇(徐峥饰)铤而走险,成为印度仿制药的独家代理商。这个故事的背后悄然矗立着的专利霸权既是一种经济霸权,也是一种政治霸权,同时还是一种规范、扭曲和构建了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文化霸权。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这个题域中有所作为,那就必须要对关联其中的种种要素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考察。

2.3 总体性多维度视域下的文化因素

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区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当我们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政治上的征用让位于经济上的剥削”(Morozov, 2022: 94)。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主要是经济性的。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家不需要像封建地主那样把自己的手弄得太脏就能剥削到劳动者。齐泽克(Žižek, 1989: 33)认为,人们之所以有时会觉得资本似乎看起来还温情脉脉,那是因为“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建构我们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而支撑幻象的是物化的信仰——譬如臣民在对国王的匍匐膜拜中确立了国王的威权。齐泽克(Žižek, 1989: 36)相信,“信仰支撑着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在本文看来,这正是为什么瓦鲁法基斯要与齐泽克在一起座谈技术封建主义这个题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齐泽克对种种明显不合理的社会幻象是如何在文化层面上被人接受的大量先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地深刻地理解、把握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新变化。

如此,我们显然不应简单地将技术封建主义看成一个经济和政治议题,而是要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对它进行审视和观照。这样的多维度视野,也是恩格斯所倡导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 1995b: 695)而马克思(1995a: 40)也明确地提出了总体性原则:“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以生产关系——而非单一的经济本身——为研究对象。卢卡奇(1996: 15)对此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统治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从总体出发看待问题,但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这个总体性视域其实并未涵盖文化要素。因此,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宣示和操演了一种从他们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论转向文化研究的雄心和立场。由此,在晚近的文化转向思潮中,文化批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题。他们以文化为切入口,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诸多要素集合在一起,对具体问题进行综合的考量和研究,不仅讨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文化产品作用于大众,而且深入探讨了文化在日常消费和商业炒作中的建构性作用。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为我们对技术封建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原则下的多维度视域和行之有效的理论思路。

3 技术封建主义与文化霸权

3.1 关于文化

当谈论文化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先在于主体的文化体系是如何让它说话的。同理,当从文化视角探究技术封建主义之时,我们希望追问的是:主体的认知模式、生活习惯、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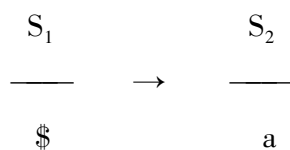
费偏好、政治立场、思维惯性、方法策略、无意识欲望等是如何被新情势下的符号象征体系所影响、制约和结构的?

雷蒙·威廉斯(Williams, 1958: 256)承认,“给‘文化’下定义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总是迫于延伸文化的含义,直到文化几乎等同于我们全部的日常生活才肯罢休”,但他还是从“理想的”“文献式的”“社会的”三个方面给文化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威廉斯:125)。而伊格尔顿(Eagleton, 2018: vi)就将文化的范围大大缩小了:“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在弗洛姆(Fromm, 1962: 70)看来,社会无意识不过就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共同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其成员意识到的内容”。另一个关联的概念是荣格(2011: 5)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层次;这个层次既非源自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把这个更深的层次称为集体无意识。”当主体降生在一个文化架构之中,他就与这个文化网络中的其他所有人一样,被这个文化赋予了某种他虽然无法意识到、但却暗中起作用的思维规范和行为模式,亦即齐泽克(Žižek, 2006: 52)所说的“未知的已知(the unknown-knowns)”。这与拉康的相关立场不谋而合。拉康认为,先在于单个主体的象征秩序借助某种结构性的力量控制和支配着主体,主体深陷象征之中无法逃离。齐泽克(Žižek, 2006: 8)总结道:以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等等为表征的象征秩序构成了“每一个言说的存在者的第二本性”。由此可见,厘清并把握住象征结构对主体的构成性影响,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的关键。

3.2 知识垄断与文化权力

在这个被意大利经济学家乌戈·帕加诺(Pagano, 2014: 1413)称之为“基于知识所有权(the ownership of knowledge)”的“知识垄断(intellectual monopoly)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消费习惯、文化品位、政治立场等等越来越被大数据的阴影所笼罩。米歇尔·吕克·贝勒马尔(Bellemare, 2020: 12)甚至认为,可以在技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techno-capitalist-feudalism)和极权资本主义(totalitarian-capitalism)之间画上等号:“事实上,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是后工业、后现代极权资本主义,即技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时代。”可是,这两者之间到底是如何被关联起来的呢?

以谷歌地图APP为例。它之所以能让用户免费使用,是因为地图公司与很多离不开地图的企业——如车企、各种外卖平台、快递物流公司等——合作,并从他们那里收取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又会转嫁给“免费”使用地图APP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攫取用户的数据知识(驾驶员在使用导航地图的同时,也将路况相关的信息上传给地图公司),大公司形成了新的垄断。那么,知识是如何在作为用户的大众和科技公司之间转手的呢?在此,拉康(Lacan, 2007: 13)的主人话语公式(见下图)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个题旨。



图中的左边,主人能指(S_1)的威权是建构在被阉割的奴隶($\$$)之上的;右边,知识(S_2)被从奴隶那里夺走,留给被剥夺与被压榨的奴隶的只有与痛苦紧密相关的对象 a (a),或剩余快感。在拉克劳(Laclau: 107)看来,“拉康意谓的主人能指的建构”就是文化霸权的运作。主人权力的来源和根基除了我们惯常理解的政治、经济、军事之外,还来自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对主人来说,“可传播的知识……总是从工匠(亦即奴隶)的技术中借鉴过来的”(Lacan, 2007: 22)。“借鉴”是委婉的说法,实则就是窃取和掠夺。中国的《诗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诗经》中很大部分内容采集于民间劳动者,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然而,在随后的年代中,铭刻在《诗经》中的知识被主人攫取,知识“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的知识”(Lacan, 2007: 22),《诗经》脱离了它原初的生成土壤,成了一部高高地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大雅之作。

相较于贝勒马尔所说的极权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语境下,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影响、制约和操控大众的这种权力由于其隐蔽性,而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为它与福柯(Foucault, 1978: 93)阐释的那种与知识和话语紧密关联的、无处不在、自下而上的微观权力颇有相似——“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信息时代的数据充斥着网络的每一个角落,垄断知识的资本用以建构文化权力的数据知识取自于散布网络的数以亿计的用户/消费者,而这些知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霸权。

那么,当这种新的经济方式传导到文化位面,是否表明贡献了数据知识的大众也加入权力的场域之中,从而使得文化权力的操演呈现出某种被稀释甚至被拆解的新状况?实际上,在齐泽克(Žižek, 1994: 18)看来,今天的大众是否仍然还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群体,已然成为一个疑问,因为“当代的大众已经是一种人为的形式,是经过某种‘被管理’、被引导的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技术封建主义语境中,大众的主体性被极大地消解,大众成为一种被权力建构起来的客体,变成了主人话语的产物,沦为文化权力的对象。

3.3 大数据下的欲望与文化霸权

在大数据浪潮中涌现出的新经济形式,对大众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心理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规约。我们知道,大数据广告推送的源点来自对用户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而依据用户偏好和习惯的推送又反过来加强了用户的喜好。在观念世界中,这种投其所好式的观点推送方式——譬如大数据下的文章和短视频推送——极易让主体产生错觉,认为身边遍布与自己认知立场相似的人。这实际上压缩了主体自主的文化想象空间,并为文化霸权的介入打开了缝隙。

而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这个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技术封建主义的时代,似乎也是一个物质欲望得到极大重视和扩张的时代。无论你想要什么,大数据就会给你加倍推送什么,用户的欲望因被大数据捕捉和关注,而被无限放大。

对此,应从两个不同层面来审视主体欲望及其文化逻辑。

其一,欲望的外在指向,亦即大众的基本消费需求。不可否认,在数字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基本物质要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只有你想不到的需求,没有商家做不到的产品。数字科技的发展确实为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红利,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欲望的内在动因。弗洛伊德曾经讲过一个他小女儿因为父母喜欢看她吃蛋糕而喜欢吃蛋糕的案例。关键并非小姑娘怎样才能吃到欲望中的蛋糕,而是“我何以知道,我首先会渴望一块草莓蛋糕?”(Žižek, 2006: 47)主体并不内在地、先验地拥有自己的欲望,而是根据他者的欲望来规划和结构自己的欲望——支撑此点的正是拉康提出的“无意识就是大他者(the Other)的话语”(Lacan, 2006: 689)。拉康的欲望观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科耶夫(Kojève, 1969: 6)的洞见,在后者看来,“所有人类的、与人文源头相关的欲望,最终都是希望获得‘认可’之欲望”。在鲍德里亚那里,人们之所以愿意付出超出使用价值之外的更多的金钱去追求某件商品(譬如,一个国际名牌包),是因为“物和符号在这里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Baudrillard, 1998: 60-61)。而从拉康视野出发,符号是欲望和物的中介,人们在消费符号之时,本质上是在为大他者的话语买单。大他者是象征秩序(the symbolic order)的另一个名称,它构成了我们现实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底层逻辑,其合理性有赖于凭借话语权而建构起来的文化信念的支撑。信念(belief)和知识(knowledge)之不同,在于前者相信、而后者真正知道某物某事会存在。在齐泽克(Žižek, 2008: 138)看来,“信念属于象征界,而知识属于实在界”,所以“我可以通过他者来相信,但是我不可以通过他者来知道”。正是因为依仗文化霸权的大他者能够在象征领域中以文化符号为手段来“说服”主体——在不同视角下,这个过程的名词有所不同:宣传、洗脑、忽悠,等等——主体才会在并不确知的情况下,倾向于相信某物某事是真实存在的。由此,主体的认知立场、知识结构、情感心理、生活方式等都被影响和重塑。

概言之,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表征的新技术状况下,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速度在客观上得到了提升,大众的消费需求也得到极大的满足。在此语境中,技术封建主义的文化逻辑主要在知识垄断和大数据操控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通过或窃取或掠夺而来的知识,一种新形式的文化霸权得以建构;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下的信息推送,主体的欲望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放大。然而,鉴于欲望的原因-对象并非任何实证性的物品或事件,欲望的终极目的是取悦大他者,产生的欲望越多、越强烈,就意味着主体越是受制于体现为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象征界。因此,文化霸权以一种全新的样态给主体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规约。

4 结语

激进的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 2022)宣称:“资本越来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而取代资本主义的,当然便是他所阐发的技术封建主义。然而,“正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齐泽克所说,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Fisher, 2009: 2),虽然“封建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以便学界能够对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样态及其政治、文化、历史等的影响进行考察和研究,但瓦鲁法基斯设想的资本主义的坍塌似乎并没来到。在当下技术爆炸的数字时代,技术创新仍然充满了活力,个人用户的创新与生产者创新结合,最终“这种用户创新然后由生产者进行普遍传播的模式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Jong, 2009: 1190)。

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当今发展,虽然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值得肯定的正面影响和便利,但技术割据、网络逻辑、数字操控同时也在文化场域中对大众心理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规约和操控。在当下一批西方学者借助封建主义的理论架构去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新现象的情势下,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和政治视角绝不可能成为自足自律论依据,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投射。技术封建主义不仅是当今经济运转和政治生态中的重要理论话语,更是一个广泛涉及文化样态和社会心理的题旨。从知识社会到知识垄断,再到知识霸权,一种新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已经悄然形成。一方面,依靠构建在专利壁垒基础上的知识垄断,文化权力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样态;另一方面,在大数据的操演过程中,主体的欲望被关注和放大,并且似乎还有了更大的满足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主体的欲望并不属于主体自己,而是根据大他者的欲望来结构的。这意味着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封建主义其实是导向了一种新的霸权形式,文化霸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参考文献:

- Bales, Kevin, Zoe Trodd & Alex Kent Williamson. 2009. *Modern Slavery: the Secret World of 27 Million People* [M]. Oxford: Oneworld.
- Baudrillard, Jean.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ellemare, Michel Luc. 2020. *Techno-Capitalist-Feud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tific Anarchist-Communism* [M]. Hawthorne, CA: Blacksat Publications Ltd.
- Bloch, Marc. 2004. *Feudal Society Volume I: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M]. L. A. Manyon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Durand, Cédric. 2022. Scouting Capital's Frontiers: Reply to Morozov's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J]. *New Left*

- Review: 29-39.
- Fisher, Mark. 2009.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Winchester: Zero Books.
- Foley, Duncan. 2013. 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 257-268.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Robert Hurly(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
- Fromm, Erich. 1962.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Gadamer, Hans-Georg. 2006. *Truth and Method*[M]. Joel Weinsheimer & Donald G. Marshall. (trans.). London: Continuum.
- Habermas, Jürgen.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M]. Thomas Burger, tra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arvey, Davi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g, Jeroen P. J. de & Eric von Hippel. 2009. Transfers of User Process Innovations to Process Equipment Producers: A Study of Dutch High-Tech Firms[J]. *Research Policy* (7): 1181-1191.
- Kojève, Alexandre. 1969.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M]. James H. Nichols, Jr. (tr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can, Jacques. 2006. *Ecrits*[M]. Bruce Fink (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Lacan, Jacques. 2007.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VII*[M]. R. Grigg (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Laclau, Ernesto. 2006. Ideology and Post-Marxism[J].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2): 103-114.
- Morozov, Evgeny. 2016. Tech Titans Are Busy Privatising Our Data[N]. *The Guardian*. 2016-04-24.
- Morozov, Evgeny. 2022.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J]. *New Left Review*(132/134): 89-126.
- Neckel, Sighard. 2020. The Refeudaliz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J]. *Journal of Sociology* (3): 472-486.
- Nietzsche, Friedrich. 1968. *The Will to Power*[M]. Walter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Pagano, Ugo. 2014. The Crisis of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6): 1409-1429.
- Posner, Eric and Glen Weyl. 2018.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kap, Cecilia. 2023. Capitalism as Usual?: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Intellectual Monopolies [J]. *New Left Review* (139): 145-160.
- Varoufakis, Yanis. 2021. Techno-Feudalism Is Taking Over [EB/OL]. (2021-01-28) [2023-12-06].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echno-feudalism-replacing-market-capitalism-by-yanis-varoufakis-2021-06?barrier=accesspaylog>
- Varoufakis, Yanis. 2021. Technofeudalism: Explaining to Slavoj Žižek Why I Think Capitalism Has Evolved into Something Worse [EB/OL]. (2021-11-01) [2023-12-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x0sq_gXK4
- Varoufakis, Yanis. 2022. Yanis Varoufakis on Crypto & the Left, and Techno-Feudalism [EB/OL]. (2022-01-26) [2023-12-06]. <https://the-crypto-syllabus.com/yanis-varoufakis-on-techno-feudalism/>
-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 London: Verso.
- Žižek, Slavoj. 1994.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M]. London: Verso.
- Žižek, Slavoj. 2006. *How to Read Lacan*[M]. London: Granta Books.
- Žižek, Slavoj. 2008. *The Plague of Fantasies*[M]. London: Verso.

- 巴赫金. 2009. 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G]//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2卷). 钱中文,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海德格尔. 2005.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雷蒙·威廉斯. 2000. 文化分析[G]//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卢卡奇. 1996.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95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涂良川,潘依林. 2023. 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J]. 世界社会科学(2): 210-225.
- 荣格. 2011.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 徐德林,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特里·伊格尔顿. 2018. 论文化[M]. 张舒语,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涂子沛. 2014. 数据之颠[M]. 北京:中信出版社.
- 吴鑫. 2023.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J]. 社会主义研究(3): 141-148.
- 于尔根·哈贝马斯. 2001. 后形而上学思想[M]. 曹卫东,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Techno-Feudalism: A New Dimens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ZHAO Chun ZENG Lijin

Abstract: Technological feudalism is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recently proposed by western academia, which, mainly focusing o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of capitalism. However, the issue of techno-feudalism has transcende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this context, the cultural logic of techno-feudalism mainly unfolds in two aspects: intellectual monopoly and big data manipulation. On the one hand, cultural hegemony is greatly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with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push of information under big data, the desire of subject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the desire of the Other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and amplification. As a result, cultural hegemony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influence to subject in a new dimension.

Key words: techno-feudalism; cultural hegemony; intellectual monopoly; big data; desire

责任编辑:陈宁